

收稿日期:2021-09-21

## 永嘉南渡诗人的生活际遇与心态转变

杨健<sup>1</sup>,董秀秀<sup>2</sup>

(1.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永嘉南渡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文士的生活与心态。永嘉南渡诗人或为名门之后,或出身寒素,或靠勤政求显达,或以文仕并举图闻名。伴随生活际遇的变化,诗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由激愤到平和,由感恨到偏安,由避世到“出处同归”。既务实又偏安适性的心态,与东晋政治形势的变化、中朝名士的精神风貌、理想人格模式以及江南的自然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永嘉;晋代;南渡诗人;生活际遇;行为方式;心态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2-0087-08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永嘉南渡文人心态及文学创作研究”(SK2021A0676)。

**作者简介:**杨健(1985—),男,安徽六安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董秀秀(1992—),女,安徽蒙城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教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2.026

永嘉南渡诗人<sup>①</sup>在两晋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一方面,他们是西晋文化与诗风的传承者,渡江以后将西晋谈玄论道的风气和儒玄兼综的思想传播到江南,诗歌创作继承了永嘉以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美学风格;另一方面,渡江前后不同的生活际遇使诗人们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这就影响到了他们的诗赋创作,进而对东晋文学的题材、体裁、语言风格、艺术表现技巧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研究永嘉南渡诗人的生活际遇与心态转变,对深入理解东晋文学的思想内容与审美风尚大有裨益。

<sup>①</sup> 本文所谓永嘉南渡诗人,是指在永嘉元年至大兴四年(307—321)间渡江,且有诗歌作品存世者或据史传记载其能诗者,共13人,存诗85首,辞赋37篇。之所以将时间下限定在大兴四年,理由有二:一是中原动荡,不少永嘉年间意欲南渡的诗人,几经周折到达江南时,已是东晋大兴年间;二是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内忧外患严重,政权稳定尚需一段时间,因此这段时间仍可视为永嘉时期的延续。

## 一、诗人南渡后的生活际遇

永嘉乱起,中原板荡,大批诗人死于这场浩劫之中,如曹摅战死于永嘉二年(308),阮修被害于永嘉四年(310),挚虞饿死于永嘉五年(311),潘尼也在永嘉年间病死于坞壁,这些人均未能随晋室渡江。只有荀组、温峤、王羲之、郭璞、庾阐、孙绰等少数诗人成功南渡,并在江南安顿下来。他们渡江的方式各不相同,或是随家族群体渡江,或是与他人结成姻亲或联盟节节南移,或是兄弟乃至独自一人艰难跋涉、辗转过江。他们在东晋王朝的生活际遇也各具特点。大体说来,永嘉南渡诗人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一)出身名门,贵盛依旧

西晋乱亡,中原世族纷纷南渡,其中就有一部分诗人,如王廙、王羲之、王彪之等,由于出身高贵,或世居高官,或德高望重,渡江以后仍然享受很高的待遇。王廙是晋元帝的姨弟、丞相王导的从弟,永嘉元年渡江。史载“元帝作镇江左,廙弃郡过江。帝见之大悦,以为司马”,“以功累增封邑”<sup>[1]2003</sup>。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提议元帝过江的第一人,丞相王导是王羲之的从伯,羲之少时受周顒赏识,后来深受王敦和王导器重,加之自身才艺不凡,在当时享有盛名。王彪之乃王导从子,永嘉元年随父渡江,其父王彬官终尚书右仆射。王彪之累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等职,后迁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其病重之时,晋孝武帝赐钱三十万给他买药,可见其地位之显贵。

由此可知,这批诗人是东晋显贵世族琅琊王氏家族中的成员,出身名门,其父兄叔伯多半官位显赫,或与当朝权贵乃至皇室有不同程度的亲属关系。永嘉乱起,他们或随家族群体过江,或过江之后融入家族之中。他们起初并不显贵,但凭借家族的荫庇,很快就官居显要,加之自身具备一定的玄学修养和文学才华,名誉和声望也随之而来。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南渡前已经显贵于世,后来天下大乱,为了避难,便组织一批力量南渡过江,荀组就是其中一例。《晋书·荀组传》载“于是天下大乱,(荀)组兄弟贵盛,惧不容于世”,永嘉末,“会刘曜、王弥逼洛阳,组与藩俱出奔”,大兴初,“自许昌率其属数百人渡江”<sup>[1]1159-1160</sup>。其实在出奔至南渡这段时间里,他曾移檄天下,拥立司马睿为盟主,睿称帝后不久便“欲以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sup>[1]1160</sup>。南渡后,其“先所领仍皆统摄”,不久又录尚书事,迁太尉、太子太保等职,其“贵盛依旧”可见一斑。

### (二)家道中衰,文仕并举

永嘉南渡诗人群体中存在这样一支:其家族在中朝原是高门大族,西晋末年,或因战乱纷起,或因子嗣不旺,或因不文,于是渐趋衰落,到他们这一代已不再显贵。为了避难,他们三三两两南渡过江,孙统、孙绰、孙盛兄弟以及庾阐、温峤等人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孙统、孙绰与孙盛三人均为西晋文学家孙楚的孙子,其家族太原孙氏在西晋也算是名门,但西晋末年丧乱不断,最终未能逃脱家道中衰的命运。史载“永嘉丧乱,(绰)幼与兄统相携渡江”<sup>[2]</sup>,孙盛乃孙统从弟,“年十岁,避难渡江”<sup>[1]2147</sup>。庾阐是颍川庾氏家族的一员,但史书只记载其父庾东以勇力闻名于世,可见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已经衰落。庾阐少随舅孙氏过江,永嘉末年,母亲为石勒所害。他到江南以后不久便孤身一人,因是庾亮族人,亮以亲族之怀对他赞赏有加。至于温峤,父温嶠是河东太守,司徒温羡是其伯父,温峤年少时以孝悌闻名于邦族。后来随刘琨征战疆场,受琨委托到江南奉劝司马睿建国,其后便留在江南辅佐帝业。时过境迁,他也只能算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sup>[3]517</sup>了。

以上五人由于家道中衰,在渡江过后,他们便不能像王氏家族诗人那样,坐致高官。要想获得声望与地位,必须付出努力,因此他们大多选择了文仕并举的道路,也就是以仕求显、以文求名。温峤过江以后,辅佐帝业,忠勤朝政,在任期间屡陈规讽,卒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受封建宁县开国公,死后被追赠大将军。庾阐先后担任尚书郎、司空参军、从事中郎、散骑侍郎等官,在平苏峻之乱时立功,被封吉阳县男,拜彭城内史。同时,他们也以文才高妙被帝王、权要赏识。《晋书》本传记载温峤“博学能属文”<sup>[1]1785</sup>,庾阐“好学,九岁能属文……又作《扬都赋》,为世所重”<sup>[1]2385-2386</sup>。《文心雕龙·时序》曰:“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sup>[4]674</sup>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孙氏兄弟也不例外,兄弟三人除孙统“居职不留心碎务”外,孙绰历任尚书郎、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等职,袭爵长乐侯;孙盛做过征西主簿、从事中郎、长沙太守、秘书监等官,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可见他们都曾出仕做官。至于文学才华更不用说,《晋书》本传曰“(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sup>[1]1543</sup>;“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是文士,绰为其冠”<sup>[1]1547</sup>;“《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sup>[1]2148</sup>。

### (三)出身寒素,勤政求显

除以上两种类型外,还有一类诗人,他们既非名门望族之后,亦非家道中衰、靠文仕并举求显之族,而是本就出身寒门,他们也有文才,也能属文缀字,但主要是靠积极参与朝政以求实现自身价值,干宝、郭璞就是这一类的代表。

干宝于永嘉五年(311)渡江,其祖、父既不是贵族,也未做过大官,他凭借自身才能担任佐著作郎的官职,后因平定杜弢叛乱有功,赢得关内侯的爵位。他曾做过东晋史官,撰写《晋纪》。在这部史书中,干宝深入分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强调道德礼仪与民情风教的重要性,显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故《晋书》称其“直而能婉,咸称良史”<sup>[1]2150</sup>。此外,其《司徒议》《山亡论》等文也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郭璞于惠怀之际,见世将乱,“于是潜结婚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sup>[1]1899</sup>。其父官不过建平太守,可见他也是一位寒素诗人。当时刑狱繁兴,百姓多有怨言,他便上书言事,要求元帝减轻刑罚、广开教化。其《奏请平刑》《谏禁荻地疏》等文也涉及国计民生问题,他在任时“数言便宜,多所匡益”。而当仕途不得意时,他便撰文表示不满,“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sup>[1]1905</sup>。这些可以看出他积极的用世精神。梅陶也属于这种类型。《晋书》无此人传记,其生卒年也不可考,但据《刑法志》《陶侃传》和《鵬鸟赋序》,知其永嘉年间南渡,元帝初为王敦谘议参军,曾和王导、庾亮等人参与讨论肉刑,据其《自叙》,可知他居官御史中丞时曾以法鞭笞太子之师,以执法严明见称。

需要说明的是,出身环境不同,生活际遇就不尽相同,这也影响到了人生道路的选择,以上三类诗人,或坐致高官,或文仕并举,或勤政求显,人生道路各不相同,正如王瑶所说:“史籍中每一个擅长学术文笔的人,都绝不仅仅以文章显。而且属文在他平生的事迹中,反而多半是比较次要的。但名门大族,多以玄理文笔等当作他们高贵和才能的表现,所以成就也多。寒士则孜孜勤苦,希图以文籍学业作为进身之资,因之也间有成功和被赏识的。”<sup>[5]</sup>

## 二、诗人南渡后心态的转变及其类型

较之于西晋末年诗人大多朝不保夕的悲惨际遇,永嘉南渡后诗人们的生活状况要好很多,他们不再为保全性命而过多地担忧,因而心态与行为方式较之于前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社会现实不再是激愤与感怆的态度,也不再抽身远害、退避乡里,而多具入世精神,对社会也多了一份理解与包容;他们虽也参政议政,但却少了一份刘琨式的悲壮感恨,多了一份平和与恬淡。由于生活际遇的变化,永嘉南渡诗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择要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由激愤到平和

南渡诗人在经历了重大世变后,辗转来到江南,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他们考虑的是稳定以及如何适应的问题,因而无暇于愤世嫉俗。较之于西晋末年诗人,他们对社会弊端多了一分理解与包容,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它,并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改善状况。如上所述,东晋初年,刑狱繁多,世多抱怨,郭璞见状便呈上《省刑疏》,建议元帝减轻刑罚,抚育百姓。干宝著《晋纪》,强调“民情风教”是“国家安危之本”,警醒统治者要吸取西晋灭亡的教训,注重教化道德,修明礼法刑政。王羲之见“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每上书争之,事多见从”<sup>[1]2097</sup>。诸如此类,可以说明他们以一种平和的态度看待种种社会问题,并力图予以解决或改善。

出现这种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江左政权刚刚建立,于内百业待兴,于外北方胡虏的军事威胁时时存在,南渡诗人要想安身立命,必须协同最高统治者巩固新生政权,“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无暇“作楚囚相对”<sup>[3]92</sup>,哀叹或抱怨时局。

### (二)由感恨到偏安

随着东晋政权逐渐巩固和郭璞、温峤、干宝等第一代渡江诗人的相继去世,那一批幼年渡江,成长于江左的文坛新秀,逐渐产生了偏安心态。两晋之际刘琨式的悲壮与感恨不复得见,取而代之的是悠游山水与谈玄论道,而这正是偏安心态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王羲之与孙氏兄弟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王羲之曾组织过兰亭雅集,在山水游览中畅叙幽情,去官后又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不远千里采药服食。较之于王羲之,孙氏兄弟也并不逊色。孙统“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sup>[1]1543</sup>。孙绰自称“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sup>[3]521</sup>。孙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sup>[1]2147</sup>。超然世事,挥麈谈玄,偏安于一隅的心态可以管窥。

### (三)由避世到“出处同归”

与西晋末年多数诗人选择抽身远害、退避乡里不同,永嘉南渡诗人大多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积极用世的精神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中有不少人既关心时务、忠勤朝政,又善谈玄理,讲求自然,从而在出世之思与入世之情之间来回奔波,形成了一种“出处同归”的特殊行为模式。这种情况在东晋初年虽不普遍,但是存在。史载王廙“性俊率”,“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sup>[1]2004</sup>,他在《奏〈中兴赋〉上疏》中也自称“飘放遐外”。到了东晋中期,这种现象越发普遍,不胜枚举。孙盛一方面博学、善言名理,曾与殷浩谈玄,“至暮忘餐”,另一方面,他又出仕做官,因家贫“颇营资货”。孙统诞任不羁,做官不留心碎务。孙绰自谓“托怀玄胜,远咏《老》《庄》”,“不与时务经怀”,但当桓温提议移都洛阳时,他便断然上疏谏止。王羲之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sup>[3]129</sup>,但当支遁谈论《逍遥游》,又“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sup>[3]223</sup>。他们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了一个人生的切合点,那就是“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sup>[3]270</sup>,即只要宅心玄远,出仕与隐居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因为从更深层次来看,他们“所追求、所向往之超世之理想,精神之境界,玄远之世界,虽说是超越尘世,但究竟本在此世,此世即彼世,如舍此求彼,则如骑驴求驴”,因而他们“追求超世之理想,而仍合现实的与理想的为一”<sup>[6]</sup>。

促成这种心态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东晋政权渐趋稳固,政策相对宽和;另一方面,他们沿袭中朝余习,对西晋谈玄之风存在甚深的精神依恋。当然上述变化是就与西晋末年诗人心态比较而言,是从整体上作出的抽象概括,至于这些诗人南渡前后自身心态是否也有变化,

也应予以分析。梅陶在《晋书》里无传,张亢与荀组渡江后的事迹史书记载也十分简略,存世作品又极少,因此他们渡江前后心态是否发生变化,不得而知。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sup>[1]2149</sup>,《晋纪》痛斥西晋虚谈之风。另外,郭璞过度嗜酒好色,干宝又加以劝诫,由此可知他一贯务实崇儒的作风。郭璞好色,南渡前曾设计获取主人婢女,南渡后仍旧好色,时常过度。温峤少以孝悌见称邦族,曾举奏当时有重名的庾敷聚敛之事,南渡后数陈规讽,忠勤朝政,可见其心态与生活行为前后基本没有变化。庾阐、王羲之、王彪之、孙氏三兄弟等人均是少时随父或舅渡江,成长时间主要在江南,因而谈不上南渡前后心态的变化。通过史料分析可知,南渡前后诗人自身心态并无多少变化,即使存在变化,也体现得并不明显,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南渡伊始,文人心态随时势变化,具体情形比较复杂,上述心态转变是就南渡诗人与西晋末年诗人比较而言,如若将永嘉南渡诗人视作一个群体,其心态又具备相对稳定的历史特征,大体说来,可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务实型,服膺儒学、忠勤朝政是其主要特征。南渡诗人群体中有这样一类:他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务实与勤俭的精神风貌,其外在表现就是服膺儒学,对朝廷忠贞不二、数陈规讽,意欲匡扶帝业。干宝、温峤、王彪之便是此类人物的代表。干宝的务实精神由《晋纪·总论》一文便可看出,他在文中强调西晋灭亡与“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虚谈废务密切相关,建议晋元帝注重民情风教。他崇尚儒学、服膺礼仪,其《王昌前母服论》言及“使义风弘于王教,慈让洽乎急难,不亦得礼之本乎”<sup>[7]2190</sup>,其《司徒议》强调司徒的属官应“敦明教义,肃励清风,非礼不言,非法不行”<sup>[7]2193</sup>,其《驳招魂葬议》力排为司马越安排招魂葬礼,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深受儒家的影响。至于温峤,《晋书》本传云其“少以孝悌称于邦族”,“及在东宫”,“数陈规讽”<sup>[1]1785-1786</sup>,在平定王敦、苏峻的叛乱中可以看出他务实奋进的心态。晋明帝为太子时营建西池楼观,“颇为劳费”,他上疏曰:“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sup>[7]1921</sup>可见其提倡俭约与务实之风,《文心雕龙·奏启》称其“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sup>[4]422</sup>,余嘉锡论及温峤云“智勇兼备,忠义过人,求之两晋,殆罕其匹”<sup>[3]518</sup>,评价之高,异于他人。王彪之也是这类人,他曾上书强调任人唯贤,考绩官吏,黜庸陟能。为维护朝廷威仪,他多次冒犯桓温。《晋书》本传记载他为会稽内史时,“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谢安欲重建宫室,他加以反对,认为“强寇未殄,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可大兴功力,劳扰百姓”<sup>[1]2010</sup>,“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邪!”<sup>[1]2012</sup>务实与勤俭之风可见一斑。此外,庾阐也可归为此类。据史书记载,庾阐母亲去世后,“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乡亲称之”<sup>[1]2385</sup>。可见他恪守礼教,深受儒学影响。在平定苏峻叛乱时,他作《为郗车骑讨苏峻盟文》,后因功赐爵。在零陵太守任上他向朝廷举荐“立身持操,行著一邦”的属下,曾抒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的悲慨,这都表明他也是一位勤于政事、效忠朝廷之臣。

二是偏安型,主要表现为体玄识远、随事行藏。到了东晋中期,江左政权相对稳定,过江文士中年长者多已去世,以王羲之、孙绰为代表的一批后起名士,中朝故国之思业已淡薄,他们虽也参与政治,但已没有了“戮力王室”、克复中原之志。他们怀着偏安的心态,以通达的眼光看待世事,一面参与现实政治,关心时局;一面谈玄论道,悠游山水。有事则“行”,无事则“藏”,其“行为与思想发生了部分的分离,以崇实的态度处理机务,以超然的人生对待生活”<sup>[8]229</sup>。以王羲之为例,他过江时尚年少,当殷浩主张北伐时,他两次遗书劝止,认为以区区江左“保准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sup>[1]2095</sup>,可见他恢复中原的志向已不复存在,偏安心态暴露无遗。他劝说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又劝会稽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sup>[1]2097</sup>。朝廷赋役繁重,他便上疏为民请命,可见他亦有经世之怀。谢万任事,他又写信劝道:“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与谢万书》)孙绰也是如此,他曾撰《谏移都洛阳疏》,极力反对“舍安乐之国,适

习乱之乡”<sup>[1]1546</sup>,由此足见其偏安心态。

三是适性型,外在表现为任诞不羁、举事自专。这类诗人或狂放任诞,或行事随心所欲,不愿被世俗事务、礼节束缚,现出一种追求适性的心态,孙统、郭璞是其代表。孙统“诞任不羁”,“性好山水”<sup>[1]1543</sup>,褚裒招募他为参军,他推辞不就。为便于纵意游览,他求为鄞县县令,“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sup>[3]750</sup>,因而刘惔称他为“狂士”,时人谓其有“楚风”。郭璞也是如此,《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璞性放散,不修威仪”<sup>[9]</sup>,房玄龄《晋书》本传亦云:

(璞)性轻易,嗜酒好色,时常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sup>[1]1904-1905</sup>

郭璞贪恋酒色,干宝曾予以劝诫,他却说人生有限,唯恐来不及享受,大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干宝只是说这并非“适性之道”,即不是追求“适性”的合理途径,但并未否定“适性”本身,可见他也默认郭璞的这种行为意在追求“适性”,只不过方式不当罢了。

### 三、影响诗人心态的因素

永嘉南渡诗人心态的转变以及务实、偏安、适性等心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具体而言,影响永嘉南渡诗人心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一)东晋政治形势的变化

司马睿南渡之初,矛盾四伏,当时政局可用“社稷焚灭”“四郊多垒”来形容:一方面,西晋灭亡,江左政权面临北方势力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又面临南方吴姓士族的强烈抵触与反抗。此外,不久又经历王敦、苏峻等人的内部叛乱。东晋王朝若要在江东立足,必须励精图治、勤政务实。对南渡诗人来说,他们要想在江南安顿下来,摆脱流亡之苦,也必须尽力协助统治者稳定新生政权。因而,东晋初年,以干宝、温峤、郭璞为代表的一批年长渡江诗人,多忠勤朝政、“戮力王室”,以图克复中原。

但时间一久,割据局面得以维持,政权相对稳定,加之渡江诗人中年长者相继去世,王羲之、孙绰、孙统等一批后起之秀,“不仅没有王导的激奋,就连作楚囚对泣的那份伤感也荡然烟消,有的只是茂林修竹、天朗气清,一觴一咏的怡然自得”<sup>[10]</sup>,中朝故国之思日渐淡薄,偏安心态渐露端倪。他们宁愿固守区区之江左,也不愿“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他们屡次谏阻北伐与反对移都洛阳,便是很好的例证。

#### (二)对中朝名士精神风貌的追恋与神往

晋室南渡,环境变化,但人们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却一时难以改变,“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sup>[3]92</sup>。王廙依舫长啸,郭璞不修威仪、嗜酒好色,乃是其自身早年中朝形成的名士风流的外露。王羲之、孙氏兄弟等人,虽未经历过中朝玄谈,但受王导、周顛、殷浩等人的耳濡目染,也对西晋名士与玄谈产生了企羨与神往。正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sup>[3]92</sup>,他们虽也表现出黍离之痛、故土之思,但更多的是怀念或向往故土上曾经发生的谈玄论道<sup>[11]</sup>。郭璞、温峤等中兴名臣也不免于此。时人评论过江第一流人物,言谈将尽之际,“温常失色”便是例证。正如刘运好所述:“东晋前期,一方面沿袭元康之风,清谈玄理,追求超脱自由;一方面又复兴儒教,裁抑浮虚,注重社会实践。中兴名臣以崇实的作风实践生命价值的追求,又以超脱自由的境界显现生命的情调。”<sup>[8]220</sup>

### (三)对理想人格模式的追求

关于理想人格模式的追求,钱志熙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东晋初期,由于面对着西晋覆亡的事实,人们希望找出造成悲剧的原因,因此思想界普遍存在着反思的情绪。玄学名士之外的其他士人,对玄风的抨击最烈,而玄学名士自身对他们的人格行为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各个阶层、各种流派的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较高实践意义的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这一人格模式影响着东晋一代的思想文化<sup>[12]251</sup>。

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既然是各种思想交互作用的产物,就有可能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它最先成为门阀士族的理想追求,这就影响到了永嘉南渡诗人。因为在东晋,门阀士族不仅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与开拓者,因而其好尚与追求对当时社会思潮、审美风尚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永嘉南渡诗人中王氏文人本就是门阀士族,而温峤、郭璞、庾阐、孙氏兄弟等人又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时间一长,自然不免受其影响。

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重在由名教的精神去理解自然人格的含义,并从自然人格中体现出他们心目中的名教精神”,其中“自然”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个性自由;一是超脱精神<sup>[12]252-253</sup>,而郭璞“不修威仪”嗜酒好色,王羲之“随事行藏”,孙绰“出处同归”,孙统“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孙盛“善言名理”,而年老“庭训愈峻”,这些行为正体现了这一人格模式,反映了他们对名教自然合一人格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

### (四)江南秀丽自然环境的影响

江南地理环境对部分永嘉南渡诗人心态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江南山清水秀、温润明丽的自然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山水怡情的可能;另一方面,买田置地,发展庄园经济,当然这仅相对其中一部分士族文人而言,他们有雄厚的资本营建庄园,可以为山水游览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西晋文人已经开始把山水游乐作为他们生活的点缀,而“把(这种)点缀变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的,是东晋士人”<sup>[13]244</sup>,前面说过,孙统、孙绰、王羲之等人居于会稽、恣意游览,这恐怕与当地风景秀丽不无关系,“他们从粗犷的风沙的北国,来到了山水明瑟的江南,面对的是四时苍郁的景色,或杏花春雨,或莺飞草长,或淡烟疏柳,或渔歌晚唱,如何能不动心!”<sup>[13]244</sup>此外,作为门阀士族文人的代表,王羲之还在这里买田置地,经营他的庄园,这从他写给谢万的信中可知:“去当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顷东游还,修植桑果。”<sup>[7]1582</sup>他们经营庄园,一方面是把风景胜地据为己有,另一方面是为山水怡情创造优良的物质条件,以便衣食之余,纵意游览。所以,当桓温建议移都洛阳时,孙绰极力反对,认为“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并非明智之举,孙绰此言实则抒发了门阀士族的心声。

综上所述,永嘉南渡对诗人内心的震动是很大的。异族入侵、江山沦落,背井离乡、仓皇南渡,使诗人们真正意识到了国破家亡的深切悲痛。起初,其中不少人励精图治,忠勤朝政,希冀早日克复神州。然而,西晋谈玄之风仍旧深深地影响着南渡诗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情趣,中朝余习在他们身上仍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而待到东晋政权日趋稳固,第二代渡江诗人成长起来之后,偏安心态便也逐渐占据上风。永嘉南渡诗人或为名门之后,或出身寒素,或靠勤政求显达,或以文仕并举图闻名。伴随生活际遇的变化,诗人心态也发生转变,由激愤到平和,由感恨到偏安,由避

世到“出处同归”,永嘉南渡诗人或务实或偏安的心态,实与东晋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相关,而适性心态与其对中朝名士精神风貌的追恋与神往密不可分。他们忠勤朝政是为了安定社稷,而体玄识远、随事行藏,则要归因于其对名教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模式的追求。此外,江南的自然环境也对他们适性与偏安心态的产生起到了促进与推动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许嵩.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2.  
 [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  
 [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9-200.  
 [7]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9]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57.  
 [10] 高小康.永嘉东渡与中国文艺传统的蜕变[J].文学评论,1996(4):5-16.  
 [11] 吴功正.东晋南渡心态与文学格调之变化[J].南京社会科学,2002(4):60-63.  
 [12]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 On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Change of Mentality of the Migrant Poets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jia

YANG Jian<sup>1</sup>, DONG Xiu-xiu<sup>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2. 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Chuzhou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The migra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jia(307 — 313) has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ut also affected the life and mentality of the literati in the West Jin Dynasty. The migrant poets were descendants of the nobility and the lower class. Many of them hankered after fame either in politics or literature. The change of living conditions had also affected their mentality. They had a very tolerant attitude towards ordeal in life and politics. This kind of pragmatic, rational mentali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deal personal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Key words:** the Reign of Yongjia; Jin Dynasty; migrant poets; life experience; the style of behavior; change of mentality

〔责任编辑:王建霞〕